

社保缴费基数年年上调 低收入群体坦言“压力大”

本报记者 张锐

近日,全国各地社保缴费基数纷纷上调,引发中低收入群体热议。比如,北京市各项社保缴费基数由去年的3726元调整为4037元,上调311元;四川社保缴费基数上调294元;安徽省社保缴费基数上调,个人参保每月多缴约60元;江苏、重庆等地也都纷纷上调社保缴费基数,社保缴费基数逐年上调,让很多低收入群体感觉“很有压力”、“不敢花钱了”。

“多缴社保费用,生活质量都下降了”

王辉去年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南城一家民营企业做行政,每月的工资2500元。“单位工资没涨,这回社保缴费基数上调了,每月又要多缴几十元钱,每月光缴社保的钱加起来就要几百元。单位再扣点杂七杂八的费用,实际发到手的钱还不到2000元,我还要承担租房、水电、网费什么的,每笔钱都得

算计着花,生活质量简直别提了。”王辉一脸苦恼。

“不过估计我还不算最惨的,单位有贷款买房的同事,每月光计算着还贷就快透不过气来了,前两天还说多缴社保又得从嘴里再省两口吃的了。”王辉说。

与王辉合租房子的同学小赵抱怨:“每月缴这么多钱,将来老了到底能领多少还不知道,反倒连现在的生活都受到了影响,以牺牲现在的生活为代价去换取将来,老了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哪,真不知道值不值得”。

网络上,与小赵有同样担心的网友并不少。不少网友“发愁”：“现在缴那么多钱,将来到了到底能不能领到?现在国家养老空账都1.3万亿元了,我们现在缴的钱都拿去养上一代了,我们将来老了的时候能不能领到钱,看来只能指望下一代喽。”

“缴得多了,拿到手的更少了”

在北京北五环一家游戏公司做文员

的王月在领到7月的工资时忍不住感慨,“比上个月又少了几十元,才1300多点儿,唉……”

社保缴费基数随社会平均工资的增长而逐年上调,以北京市近几年的社保缴费基数为例,2007年为3008元,2008年为3322元,2009年为3726元,今年为4037元,这让很多人开始关注起社会平均工资的确定,很多人直呼自己每个月的工资根本“达不到”平均工资,感觉自己是被“平”了。

“当前确实存在因为缴纳社保费用,造成个人负担加重,中小企业运营成本增加的问题,对很多工资没涨有些甚至还降低了的中低收入群体来说,确实可能出现今年拿到手的钱比去年还少的情况。这也说明当前的社保制度还存在不尽合理之处,社会平均工资不能反映中低收入者的现状。”一位长期从事社会保障工作的有关人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社保缴费基数高、居民手中可支配收入

减少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接受某媒体采访时就曾建议降低社保缴费,缺口由国企利润填补。

1991年国务院决定改革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经过探索试点,各地逐步建立起统筹账户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养老保险体系,对之前没有养老账户的人群视同缴费,这就造成虽然有账户,但实际上上面并没有钱,造成社保基金空挂的问题。

据此,该有关人士表示,国家应当做出做实账户的计划,不能遇到问题才解决问题。我国应当逐步建立合理、完善的社保制度,使其成为社会经济的调节器,与民生直接挂钩,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

目前没有相应法律法规对社保制度进行保障,是当前老百姓对“下一代缴费养上一代”的现状产生担忧的重要原因,应当通过建立法制保障来化解这种担忧。

“有了法制保障,下一代缴费养上一代的担忧也就化解了”

资料显示:1949年新中国成立伊始,建立全国性的社会保障就被提到议事日程。9月29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共同纲领》,其第32条规定:逐步实行劳动保险制度。据此,1950年由劳动部部长李立三主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草案》,于10月29日公开发表,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1951年2月26日正式颁布。

据翔实律师事务所郭兴昌律师介绍,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92年10月1日之后,我国社会保障才上升到实际缴费的阶段,因此将从建国以后至1992年之前的这部分参加工作的人员就看作视同缴费。

在今年6月份举行的“华南师范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成立暨社会保障法论坛”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法制司有关人士曾表示,《社会保险法》有望年内出台。

对此,郭律师告诉记者,“由于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还存在一些管理上不到位的问题,因此急需法律来进行规范。尽管《社会保险法》的出台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有法可依’比‘无法可依’毕竟还是朝着前进的方向又迈了一步。”

“有了法制保障,大家就不会有‘我们缴费养上一代,我们将来会不会有人养’的担心了。”郭律师表示,社会保障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良好的法制环境来进行,因此国家还应加强宣传和引导,增加透明度,化解百姓的担忧,促进我国社会保障工作的发展。

与祖国同行 与时代共进

——全国学联5年工作纪实

新华社记者 李菲 赵超 崔静

“祖国荣誉高于一切”,是他们嘹亮的青春口号;

“到西部去、到基层去”,是他们对祖国和人民的青春誓言!

……

全国学联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5年来,广大青年学生高举理想旗帜,争做国家栋梁,展现出蓬勃向上、务实进取的精神风貌,以实际行动证明了当代青年学生是值得信赖、堪当重任、大有希望的一代。

5年间,各级学联、学生会组织按照党和国家的要求,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全面落实全国学联二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工作任务,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绩。

旗帜鲜明、生动活泼——以引导同学为目标做当代青年学生的“领路人”

5年来,各级学联、学生会组织抓住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五四运动90周年和庆祝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新中国成立60周年等等重要契机,深入开展“我与祖国共奋进”主题教育实践活动,一次次国情考察、一场场形势报告、一组组鲜活数据,让广大同学发自内心地感叹祖国发展的巨大成就,抒发着坚定不移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青春豪情。

从2008年在江西井冈山革命老区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到2009年在东莞见证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成就,再到今年在重庆唱响红色经典,这些活动的开展,让马克思主义在大学生骨干的成长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成为他们进行思考、作出判断的“主心骨”,进而成长为坚定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

5年来,团中央、全国学联通过开展各种活动积极营造关心支持大学生自立自强、健康成长的社会氛围,在广大青年学生中树立了一批可敬、可亲、可学的典型,以榜样魅力感染激励青年。

面对历史罕见的冰冻、干旱和地震灾害,他们毫不退缩地挺起了自己的脊梁;服务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上海世博会等大型赛会,他们用真情和汗水引领了志愿服务的时代新风……当代青年学生在学联、学生会组织带领下,为“80后”“90后”赢得了新的光荣与信赖。

着眼需求、力求成效——以服务同学为手段做当代青年学生的“贴心人”

学联、学生会组织是青年学生自己的组织,从新生入学开始,就应该想学生所想,急学生所急,帮助学生解决在求学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5年来,各级学联、学生会举办了学术、科技、文化、体育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为广大青年学生搭建了提高综合素质、展现青春风采的舞台。其中,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挑战杯”系列竞赛是广大青年学生心中知名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校园文化活动,每年都吸引全国1000多所高校、数百万同学积极参与。

5年来,学联、学生会组织高度重视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帮扶工作,通过多渠道筹集资金、开展勤工助学、组织慰问等活动等方式,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2008年高校毕业生人数559万,2009年611万,2010年超过了630万,高校毕业生人数逐年大幅增加。面对日趋严峻而复杂的大学生就业形势,全国学联明确提出,以提高大学生就业能力为目标,以开展就业创业教育为基础,努力构建包括意识培养、观念转变、素质拓展、技能提高、实践锻炼等环节的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的工作体系。

——实施大学生KAB创业教育项目,旨在通过吸收借鉴国际经验,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创业教育之路。

——组织动员广大同学参加就业创业见习基地建设。截至2010年6月底,全国高校共建见习基地14815个,提供见习岗位375512个,已上岗见习的学生超过20万人。

人们有理由相信,学联、学生会组织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必将继续发挥在学生组织体系中的核心枢纽作用,成为当代青年学生的“领路人”“贴心人”!

(据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院士专家企业工作站落户五星太阳能

本报讯 日前,广东省太阳能行业首家院士专家企业工作站落户广东五星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这也是我国太阳能行业在企业建立的第一家院士专家企业工作站。

据介绍,院士专家企业工作站是院士、专家与企业结合的桥梁纽带,是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培养自主创新人才的重要手段。院

士专家企业工作站落户五星公司后,将进一步动员和组织五星科研部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技术项目为纽带,以院士专家和专业学会为依托,加速企业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并将借助国际国内的高端人才,促进广东乃至全国太阳能科研实力的发展,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促进行业内人才的交流。(西陆)

“申遗”三大怪象

(上接第1版)

中国文物学会世界遗产研究委员会秘书长丹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遗址保护费用稀缺现象比较严重,项目账面上的保护费用许多实际也用于他处。资金配备体制不健全、层层盘剥分流,商业盈利意识大于保护意识是导致这种状况的主要因素。”

据介绍,虽然一些热门景区游人如织,门票收入可观,但落实到保护上的资金极为有限。除去上缴政府、财政、旅游公司和维持人员开支的资金,平均用到遗址资源保护上的资金连门票收入的10%都不能保证。据统计,云南石林风景区2006年至2008年3年间门票收入9亿多元,而用于景区日常维护的经费占门票收入不到10%。

与此同时,一些遗产项目中办后急于扩容,有的甚至搞破坏性开发,被限令整改后拆除成本又占了一部分维护费用。仅张家界和石林用于整顿景区秩序、拆迁违规建筑的费用就高达数百万元。

采访中记者发现,尽管许多项目在苦于缺乏维护费一事上各有说辞,但公众并不买账。“为什么在中报期间不惜成本,申报成功了就吝惜保护费?为什么上面要求保护环境可以不讲投入产出,保护遗址就找钱见肘?”内蒙古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潘照东说。

申遗者热情高涨 老百姓看法不一

我国自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以来,已拥有40处世界遗产,位列世界第三。而每个项目单是前期的规划编制、研讨论证、国际咨询、公共活动等动辄就要花费成百上千万元。

只有“申遗”一条路么?是不是没有“申遗”的项目就得不到百姓认可和相关保护?相对于官方的热情和巨大投入,记者在采访中却发现,公众对日益升温的“申遗热”褒贬不一。

许多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申遗”本身是件好事,如果优质遗产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提高知名度并提升大家对它的了解和保护意识,那么皆大欢喜。然而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对“申遗”初衷和由此引发的景区门票涨价提出质疑。

上海一家国企部门负责人刘险峰说:“‘申遗’成功是国家的荣誉,自然遗产丰富的我国申报理所当然,但公众最担心的是——又要涨价了。现在很多地方动辄一两百元的门票相对于普通百姓的收入比例太高,不免有敛财之嫌。”

北京市民李金刚说:“普通百姓没有渠道表达看法意见,对‘申遗’的目的和作用也不甚明

确;另外,几乎所有项目都没有向公众公布,费用不透明都不知道纳税人的钱花在哪儿了。”

粗略统计一下近年来身陷“涨价门”的景区,就不难发现公众的担忧并非没有原因,例如:申遗成功后的石林,门票从先前的140元调整到175元,黄山旺季门票由200元上调为230元,一些著名景点的门票价格都在“申遗”成功后一路上扬。

乡土建筑保护专家、原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陈志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有些“申遗”之所以“变味”,源于有的申请者动机不纯,对遗产的价值、性质、功能和传承性缺乏认识,单从局部利益出发,导致遗产的人文化、商业化和城市化,严重损害其价值。

“保护动力”向左 经济效益向右?

为维护世界遗产“权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将“严格保护、合理利用”放在首位,同时建立了监测机制,“世遗”一旦受到某种严重威胁,可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甚至除名。

尽管有严惩措施,丹青却仍对一些“世遗”项目的现状表示担忧:一些地方在商业利益和不良政绩的驱动下背离了保护遗产、传承后世的初衷,在经济利益诱惑下演变成“文化搭台、经济唱戏”,“遗产蜕变为‘产出效益’”。

这似乎成为“申遗”成功后的普遍现象:一旦某地的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其品牌效应便迅速放大,成为旅游业的“金字招牌”。“申遗”的意义,很大程度上被放大为对GDP的贡献率,并被遗产所在地政府津津乐道,而进行有效的遗产保护却被抛在脑后。

以1997年“申遗”成功的山西“平遥古城”为例,门票收入从“申遗”成功当年的125万元增加到2008年的7500万元。旅游综合收入从1997年的1250万元增加到2008年的6.7亿元,旅游收入占当地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不到1%增长到2008年的13.91%。

而在1997年当选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南丽江古城,申遗成功后游客数量连续多年年均增长10%以上。2009年旅游业收入88.66亿元,同比增长27.49%。旅游业对当地GDP的贡献率常年保持在50%以上。

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教授指出,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本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具有不可复制和不可替代性。但在不良政绩观的驱动下,必然会出现“重申请轻保护”的现象,靠大搞旅游开发来换取经济利益。有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即便申遗成功,一些世遗终将难逃被毁灭命运。(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机关改革,彭隆荣第一刀就“砍”在了自己身上,妻子出现在裁员名单中;出差回来,每张单据都有彭隆荣一人签字不能报销,必须有经办人、证明人分别“画押”,完全遵照财务制度执行……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彭隆荣的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就像一个无形的坐标,不仅在南田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中形成办事公正透明的风气,进一步树立了强化了南田领导作为经营者的权威性,而且让职工在心服口服中认同、履行这样的价值观和行为风格。

与此同时,南田农场进一步健全完善了职代会、场务公开等职工民主管理制度。比如,每年召开2次职代会是雷打不动的,凡涉及职工利益的重大问题,如产业结构的调整、经营机制的转换、发展规划的确定、规章制度的制定等,必须经职代会讨论决定。由于各项决策以及制度都是职工意愿的集中体现,它们就像企业的“小宪法”一样具有权威性,条件有规定,事事能兑现。

基于推进改革需要对职工民主权利的尊重和政治关爱,就这样暗合了企业文化建设的规律——



武汉每天10万 “牛皮癣”登墙入室

(上接第1版)

把住思想政治建设的方向盘

今年年初,让连队指导员王小飞没有想到的是,在第三批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整改提高阶段,第一个遭到“弹劾”的竟是自己这名基层政工干部。原因是,连队在年初的保障任务很重,指导员在科学统筹方面欠火候,教育和训练两项工作有“打乱仗”现象;结果在活动测评中,很多战士也给了其“不满意”的评价。

谈起这件事,王小飞深有感触:“党的创新理论既是路标,也是镜子;不光给连队的建设指明方向,也能校正我们前进路上的一些偏差。”的确,在党的创新理论的指引下,这个红旗连队在几十年的革命征程上,一直保有“跟着党旗走,宗旨记心间,举旗当传人”的红色氛围。

记者采访了解到,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导航,使得汽车连官兵的思想认识高度一直走在前列。

上世纪60年代,汽车连修建了雷锋广场,把雷锋精心擦车的巨幅画像矗立在广场中央,定期坚持在雷锋广场开展教育活动;直到今天,像雷锋那样爱车、开车依然是全连官兵的自觉追求。

上世纪70年代,连队创新“两红(红旗车、红旗驾驶员)”评比,明确提出,“两红”首先是“思想红”,这个创意在全军汽车分队推广开来。

上世纪80年代,连队首创的《文明服务公

约》在全军推广;进入新世纪,连队总结的《安全行车法》再次被全军推广。

多年来,连队涌现出9名安全行车百万公里的技术尖子,有8人被解放军总部和空军树为“红旗车驾驶员标兵”,还有64人次被空军评为行业标兵,190多次在上级组织的各类比武竞赛中夺魁,3380人次被连队评为“红旗车驾驶员”。

创造安全行车最高纪录的奥秘

60年来,连队行驶总数已达5850多万公里,创造了全军汽车分队安全行车的最高纪录。记者采访了解到,这背后有科学的管理,有严格的规章制度,还有安全预防的长效机制。

在这个汽车连,记者得知了推进管理改革的三个细节。一个细节是,根据人体生理周期的特点,为每个司机绘制了“生理节律图表”,按“图表值”来科学调度车辆;第二个细节是,改以以往迎接检查任务重于其他工作的方式,坚持按照周计划、月计划来安排工作;第三个细节是,废除夜航飞行不予补充睡眠的“上规定”,允许推迟半个小时起床。

这个汽车连重在科学创新中求发展,让安全预防走向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之路。比如,对飞行日、机械日、车场日等工作抓到什么标准,车辆行驶走什么路线,停到什

代会的420多名职工代表和列席代表全部吃住在这里。

“过去企业困难修不起礼堂,我们只能坐在胶园的树荫下开职代会。”张桂芳说,8月8日那天,大家像过节一样开心,“南田的每一个发展进步,都有我们职工的份儿”。

清楚南田发展历程的人都清楚,张桂芳这番话,道出了南田人能够数十年来始终保持奋发向上精神状态的一大秘诀——企业发展,人人有份。

“坚持企业利益最大化和职工利益最大化的统一,是我们一直倡导和坚持的核心价值理念。”南田农场党委书记吴玉英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与职工是利益共同体,企业发展了,职工利益才有保障;反之,职工利益得到了尊重,才能激发出劳动热情和创造力,企业发展才能充满生机和活力。

基于此,南田在推进改革时,既大胆创新体制、机制,充分解放生产力,努力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又始终坚持共同富裕的理念,让农场职工切实分享到发展的成果。

比如,当年针对国有农场既有组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优势,同时在传统体制下对于种植业又存在管得过细、难以管好的弊端,南

田农场在非股生产领域,实行了“两统一分”的家庭承包经营;“两统”就是农场把国有资源的配置和管理统起来,把职工自营经济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统起来,“一分”是职工能自理的一分到底,由职工家庭“自我投入、自我经营、自我积累、自负盈亏”;在国有股园的收入分配上,实行职工和农场按一定比例分成,超产部分收入职工全留下的承包分配办法,“交够企业的,剩下的全归自己”。

这种统分结合的企业家庭承包经营和国有股园的承包分配办法,在制度设计层面就充分体现了全场职工总体受益的理念。

事实上,让职工真正受到支配劳动成果的主人,使他们切实感受到农场的改革发展与自身利益休戚相关,便能极大地激发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上述改革实施当年,南田就全部补发了拖欠职工4个月工资,全部还清了拖欠银行近千万元的贷款,很快踏上了脱贫致富之路。

如今的南田农场,早已实现了风调雨顺。截至2009年底,企业社会总产值达8.51亿元,职工年均收入达3.8万多元,连续8年居海南垦区第一,改革18年职工年均收入增长了19倍。

“南田几十年的实践表明,没有经济杠杆

的撬动,政治关爱激发出的职工劳动热情往往难以持久。因此,企业文化建设必须建立在实实在在的物质基础之上,以科学、合理、公平的绩效评价和分配制度,让职工实现经济利益。

彭隆荣透露,南田一直在探索职工参与分配的新办法,如2002年种菜集团组建后,职代会就作出决定,企业拿出一定比例的利润为企业配股,使职工持有企业的股权,“这样职工不仅参与工资分配,而且参与利润的分配”。

“我们‘四个一’(即一份产业、一份股份、一栋楼房、一辆汽车)的目标很快就能实现。”张桂芳说,现在全场98%以上的职工有了自己的种菜基地,4000多户职工建起了“芒果楼”,228户职工买了小轿车,“如果种菜集团能够上市,一份股份就是实打实的,我们的日子将更加红火”。

至此,记者不由地想起初到南田时的一个场景:当记者追问为何将南田开发的第一个国际度假酒店取名为“好汉坡”时,彭隆荣简短而富有深意的回答——南田有爬不完的坡,更有永不气馁的好汉精神。

而一切为了职工,则是好汉精神的永动力!